

拿什么保障公民的“不理睬权”

不知从何时起，“压力山大”成了都市白领自嘲的流行语。“有压力时觉得累，没压力时觉得可怕”，“加班压力大，不加班压力更大”。有统计显示，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本土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压力山大”引发巨大社会成本

压力的反义词是轻松。人不可能总是在轻松中生活，人活着就会有压力。从心理学角度看，“压力是心理压力源和心理压力反应共同构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体验过程”。没有人可以免于压力。一个人只要生活在现实中，不管喜欢不喜欢，压力总是如影随形，陪伴着人的日子。人无压力轻飘飘，会产生无着无落之感。有一些压力是人所需要的，对人生起着良性作用，能让人保持清醒并作出良好表现。譬如，压力产生人的某种内动力，压力会让人奋力前行。人在一定的压力下，挖掘出自己平日所不能了解的潜能。但人在对生活中的人与事不断地作出反应中，“压力山大”，就不同了。“压力山大”，是极端痛苦的感受，当它持续地迁延下去，人就会被压得变形，就会使人的身体系统感到疲劳不堪并受到极大的损害。最新的一项“2012关爱职场白领、关注白领健康调查”显示，2/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处于亚健康状态，危害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中，工作压力、环境污染和缺乏锻炼位列前三位。另外一家世界知名调查机构也得出过类似结论：本土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中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

“压力山大”，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生活由此变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并变异为某种玩笑，这又是遇到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压力山大”不是别的什么，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现实。“压力山大”是职场压力、住房压力、养老压力、上学压力、升迁压力、就业压力、社会环境压力。这一系列压力，有些是不好转化的。当压力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人所感受到的焦虑，就从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变成精神障碍疾病。可以说，有害的压力使人感到无助、灰心，一旦超过了心理承受能力，有的人就会一下子被压倒，有些人则是温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觉中崩溃。

人们无法避开压力，消解压力，活着，就形同找借口苟活。人们之所以“压力山大”，另一原因是不敢期待未来，对前景没有安全感。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不完善，使得人们对医疗、养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问题缺乏稳定感。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公平不公正，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产生被相对剥夺的种种感受，无法找到个人归宿，则加深加重了群体性焦虑情绪。而这一切都需要个人及社会的成本付出，于个人是透支身心健康，于社会是产生更多的不和谐。 今语

10月25日夜，上海长宁区警方查获一名男子违法酒驾。他就是演员王志文。案件得到了快速处理：王的血液中酒精含量未达到醉驾标准，警方对王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扣12分，罚款1000元。

严格执法才能“触动”明星不酒驾

王志文酒驾，似乎颠覆了他顾家守法的好男人形象。明星酒驾也算不得新闻了，去年，高晓松因为醉驾，被“顶格”判决6个月拘役；著名相声演员刘惠因为醉驾，被判处4个月拘役；再早的有武打明星吴京因为醉驾被拘留，莫言因为醉驾引发交通事故而死亡……作为有巨大影响力的明星，其酒驾行为不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更有恶劣的示范效应，形成“次生灾害”，特别是像王志文这样公共形象正派的明星，却违法酒驾，影响更甚。自去年醉驾入刑以来，醉驾违法、害人害己的道理深入人心，甚至一些明星还在公众平台对不文明的驾车行为大加谴责，但何以其中仍有一些人会以身试法呢？

其实，车祸对于王志文，是有切肤之痛的。1979年，王志文的父亲就死于上海的一场车祸，全家失去了顶梁柱，当年王志文只有13岁。1998年他和江珊合演了电影《说出你的秘密》，讲的就是车祸逃逸的故事。今年，王志文在一次访谈里还讲述了他的亲历：一辆车撞了他的车后轮却逃离现场，他开车追停那辆车，训斥女司机称：逃跑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他感慨地说：“如果我不去拦下她，跟她讲这个道理，她还是以她的方式开车；但我在现场，我去做了，相信她是有触动的话。什么叫力量，就是去完成每个人力所能及的那部分，它就会产生力量。”

可以从近日王志文的作为看，他并没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那部分”。

然而，谁能给王志文、给屡屡酒驾的明星们一个“触动”呢，告诉他们酒后驾车是错的，正人先正己？这还得依赖严格执法和舆论压力。

法律的威严不在于其残酷性，而在于其必然性，即任何违法都必然受到惩罚，没有侥幸的可能，那么法律自然有权威。就打击酒驾而言，就是严格执法不松懈，统一标准不打折。严格执法是最好的预防，也只有严格执法才能消除醉驾者的侥幸心理。醉驾入刑一年时间里成果显著，全国公安查处酒驾数量同比下降41.4%，醉驾同比下降44.5%。

这种严格执法，正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醉驾可耻的社会氛围。对于明星的违法酒驾，舆论应该宽容忍让，让明星知道：自己错了，不诚恳反省是得不到粉丝原谅的。

高晓松出狱之后，积极现身说法，拍摄了禁止酒驾的公益宣传片，一举扭转他的负面形象。那么，作为孩子的父亲，作为因车祸失去父亲的儿子，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演艺明星，王志文现在又应该怎么做呢？ 欣欣

日前，在向听众讲解《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时，山东省法制办负责人的一番话成为全国性的一个热点——针对有些行政机构滥用“红头文件”的问题，该负责人强调，今后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公布，没有编号，不符合规定的文件视为无效，公民可以置之不理。

在严格依法行政的制度环境中，违规文件显然不能作为行政部门的执法根据，人们当然可以置之不理。然而，重申法治常识被当成新闻，值得深思。

民间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滥发文件的不满由来已久，戏称“乌龟的屁股——规定(龟屁)”。诙谐调侃表达出民众对这些文件合法性、规范性、科学性不足的无奈，也反映出公民对政府文件的监督之力。一方面，许多造假文件、违法行为因此有了灰色市场，现实中诸如花200元可

我严重怀疑这4家医院不是什么独立法人，而是一家医疗集团的4个分院。不然“没有引产药水”、“没有床位”的扯白怎会如此高度一致？

医院本是希望所在，救人之地，奈何却成了绝望之处、死亡之所，如此泾渭分明的角色错位与责权倒置，着实让人惊悚莫名。

一谈及拒医，少不了医德的宏大叙事以及制度的深度剖析。以德治医和以法治医，无外乎是社会

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注意到文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正像山东一样，规范了文件的制定程序，要求重大行政决策必须过“五道关”，重申了公民的“不理睬权”，这无疑是好现象。问题是，对于违规文件的审查与监督，重点不是依靠相对人消极的不予理睬，而应通过严格的问责机制确立起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权威，并赋予公民对规范性文件更多的监督权和救济权，其中就包括必要的司法制度安排。

随着依法行政的深入发展，对政府公共治理依据的规范越来越成为重点。如果各地都能为规范性文件套上约束的“缰绳”，融入民主监督的基因，确保公民不仅可以非常淡定的“不理睬”，必要时还能够理直气壮的监督，依法行政的步伐就能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傅达林

“没有针水！没有床位！”10月25日，怀孕8个月的赵女士产检发现胎儿已停止胎动两天，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做手术。但她先后辗转至另外3家医院，都被以各种原因拒绝。业内人士认为，医院拒收高危产妇的根本原因是担心惹上医患纠纷。(10月27日《都市时报》)

由此可见，水土不服、适应不足、客场作战……种种制约因素让“考试机器”——中国高中生在SAT面前暂时不知所措，这种现象在TOEFL和GRE引进中国的早期也曾不同程度发生过，但随着中国学生对这些考试规则的熟悉和五花八门培训班的“特训”，如今早已不在话下。

如今许多商业教育机构和评论家正忙于拿SAT说事，讲体制也好，指出路也罢，看相测字，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要兜售“破解之术”——前面说过，TOEFL和GRE从天堑变通途，一靠考生越来越适应其规则，二靠各种商业强化班的“恶补”，正所谓“缺啥补啥”，冬令进补，正当其时，那些做忧国忧民状的商业教育机构，恐怕早就备好各色大补丸，捧报价单的双手也早激动得发抖了吧？

前已述及，中国考生SAT成绩差，“不熟”和“欠补”是关键，而今中缘由，则是这项考试“火”起来。可想而知，随着时间推移和“药房”越开越多，SAT变成又一个GRE，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是届时别再沾沾自喜，以为分数的提高，就意味着中国“素质教育”的脱胎换骨时刻已到就好。陶短房

“京城来的”并不高人一等

27日晚，深圳地铁列车上一女子躺在座位上，一人占了两个人的座位，被周围乘客劝说后，竟破口大骂，称“土鳖，我京城来的，你比得起我官大吗？”还称“我躺这里怎么了，我坐地铁跟你有什么关系吗？”(10月28日《深圳电视台》)

这位女士可谓是一个表现力极强的人，只用短短几句话，便将自己浅薄虚荣的气质和个人修养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她的几句习话拿来分析，确实有点意思。第一句骂指责她的人是“土鳖”，显示的是她潜意识中自以为很“洋”；第二句“我京城来的”，显示的则

是一种让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第三句“你比得起我官大吗？”，则是前两句的概括和升华——因为我是京城来的，你比不起我官大，我不文明地躺在地铁列车上，你没有权力管我。

从善良的出发点来推测，该女子也许如电影《搜索》中那个因为自己查出癌症而在公交车上失态的女白领那样，有自己失态和妄语的原因。也许她当时正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而要躺下，因为缺乏沟通和解，而引起误会，情急之下出语惊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事实上，网上四处流传并已成为热点新闻的视频，已使她付出了并不低的代价。

其实，像这种浅薄的恶劣事件绝不是孤例，四年前，同样是在深圳，一位自称是“从北京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的官员林嘉祥，酒后猥亵女童发出疯狂叫嚣，其语意和语气，甚至语言背后暗藏的思维模式，都与地铁叫骂女如出一辙——同样的做了不文明的事情，同样的理直气壮，同样的觉得“北京和官”这两重身份可以使他免除处罚和管理。而事实上，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因少数人的不文明而质疑和指责所有北京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是不客观，也是不公平的。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证明这位女子是北京人，但是，其行为本身客观上已经给北京抹了黑。不论如何，那些喜欢说“北京来的”的人，还是请收起这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陈腐特权观念。

曾颖

花钱买排名买的是浮云

至少10家机构先后发布好几十个榜单，大学排行榜，真真假假水深多深？

10月27日，第七届科学计量学与大学评价国际研讨会在武汉举行，各位代表就高校排行进行了热议。业内人士说：部分高校花钱买名次。(10月28日新华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研究机构对各大大学进行排名评价。本土的大学排行榜，到底真不真实、可靠不可靠？它有没有所谓的潜规则？关于高校花钱买名次，已有事件当事人及部分媒体见报的新闻稿件作了“佐证”。

大学是什么地方？在人们的老概念里，它是一方纯净之地，是做学问的地方。大学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所在，作为研究学问的机构，自有它的学术尊严及人格化书写。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现在的大学教育是行政化式的，就是教育权力化。教育中的一切，不是教育本身说了算，而是教育之外的东西说了算。大学的另一个特征：差不多就是一个就业教育，与就业无关的教育很难进入大学校园。为此，有人还制造了许多好听的名目，但这样的做法，既脱离了教育的理想，亦脱离了大学的本质。

大学向权力聚集，对金钱臣服，就会营造出急功近利、肤浅急躁的氛围，就会失去知识上的独立，学术的自主，就会没有了自己的个性。招天下俊才而不断毁之，就会出现花钱买名次这样浮躁的事情。一切似乎都可以花钱买

来，尽管买的不过是浮云，不过是虚荣、虚幻。

花钱买名次，很不是那回事儿。花钱买名次，所涉及的是评价体系中的客观性、公正性问题，而这问题又直接关系到部分学子的人生命运。花钱买名次，大学的发展会有许多方式，而自欺式的欺人式的花钱买名次，只会构成发展的障碍，只会败坏学校的学风，只会误人子弟。而且，任何东西都敢弄虚作假，任何东西都会失去它全部的信誉。诚信一旦被质疑，那这样的排名还有啥意义？一些大学所得到的名次还有啥权威性？

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就这样被搞成一个笑话。你怎么看？ 伊文

日前由杜克国际教育发布的《2012中国SAT年度报告》显示，参加美国高校入学考试SAT的中国高中生达到1800分线者不足7%，达到2000分线的仅有2%，这意味着98%的中国考生很难进入美国最著名的30所大学本科学习。

中国考生SAT低分与素质教育何干

中国学生向以善于考试著称，TOEFL、GRE高分频出，以至于美方不得不一再修改考试规则，如今纷纷栽倒在SAT门槛前，令人大跌眼镜。

一些论者据此认为，中国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和“综合能力”，言下之意，SAT分数低是“体制问题”和“素质问题”；还有论者则强调“不能死学语言”、“要改变学习方法”，并暗示只要照着他们给出的明路去做，前途就会一片光明。

SAT这个“美国高考”当真这么神，以至于把“应试机器”——中国高中毕业生也给镇了？

首先，SAT所针对的，是那些以英语为母语、以美国教育模式为范本，接受其自小学至高中连贯教育的应届高中生，中国考生既非英语为母语，从小所受的教育也是另一个模式，从课程设置到教材、教学方法、考核模式，都差异巨大，去参加这样一个“洋高考”，分数“打折”是正常的。

其次，这项“美国高考”在中国开展时间不长。传统上中国赴美留学，以攻读硕士以上学位为主，需要的是GRE和TOEFL分数，而无需SAT分数，近年来随着留学年龄节节降低，和国内国际学校的增多，让子女参加“美国高考”，SAT才开始“火”起来。此次出台的这份《2012中国SAT年度报告》，事实上是一家商业教育机构所发布的非正式报告，且今年也不过是第二份。

由此可见，水土不服、适应不足、客场作战……种种制约因素让“考试机器”——中国高中生在SAT面前暂时不知所措，这种现象在TOEFL和GRE引进中国的早期也曾不同程度发生过，但随着中国学生对这些考试规则的熟悉和五花八门培训班的“特训”，如今早已不在话下。

如今许多商业教育机构和评论家正忙于拿SAT说事，讲体制也好，指出路也罢，看相测字，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要兜售“破解之术”——前面说过，TOEFL和GRE从天堑变通途，一靠考生越来越适应其规则，二靠各种商业强化班的“恶补”，正所谓“缺啥补啥”，冬令进补，正当其时，那些做忧国忧民状的商业教育机构，恐怕早就备好各色大补丸，捧报价单的双手也早激动得发抖了吧？

前已述及，中国考生SAT成绩差，“不熟”和“欠补”是关键，而今中缘由，则是这项考试“火”起来。可想而知，随着时间推移和“药房”越开越多，SAT变成又一个GRE，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是届时别再沾沾自喜，以为分数的提高，就意味着中国“素质教育”的脱胎换骨时刻已到就好。陶短房

监管“假宽带”别陷入“技术依赖”

针对“宽带不宽”的种种疑问，近日，《新京报》记者对北京市场进行了调查，发现一些小区宽带存在高价低速的问题，1920元包年的4M宽带，实际网速竟只有100K。一些小区宽带被一家运营商所垄断，运营商进小区要宽带用户向物业交费，这已成为一项潜规则。

“假宽带”问题，根子在垄断，但监管的缺失同样不能忽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十年来中国宽带市场高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监管制度的发育远远滞后。即便是最近几年，“假宽带”问题屡屡卷入舆论漩涡，引发众怒，但是，监管部门的反应似乎依然迟钝，迟迟未拿出有力举措。

监管“假宽带”，一些技术的难题屡屡被提及，例如“假宽带”怎么界定，如何制定科学的规范等等。近日，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张峰就表示，工信部已经启动了一项研究所和企业参加的研究，来确定中国自己的网络测速标准，近期将会公布。

监管“假宽带”，相应技术标准的完善，当然需要。不过，这并不只是说，在技术标准不完善之前，监管就难以有所作为。

以在小区宽带被垄断为例，运营商和小区物业结成垄断联盟，这已违反了相关法律。如《电信条例》规定，对于“非法组织或者妨碍电信业务经营者向电信用户提供公共电信服务的行为”，最高可罚10万。工信部和住建部也曾发通知，要求小区“不得与电信运营企业签订排他性协议，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其他电信运营企业的接入和使用”。

也就是说，打击“假宽带”，监管部门手中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并不匮乏，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只要严格按相关法律执行，至少，小区宽带垄断并不是无法可治。

此外，“假宽带”问题，未必只有靠先进的技术手段才能发现，例如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小区有2200余户因网宽用户，如果按每户使用4M宽带计算，小区的流量应该是880M，而实际上，相关运营商所拥有的带宽，总共只有200M，这点带宽，全部给这一个小区远远不够。可见，只要再弄清楚一家运营商拥有的带宽和这一带宽所服务的用户数量，其实很容易就可算出运营商是否存在虚报带宽、欺诈用户的行为。这个问题连记者都能调查出来，作为专业的监管部门，想要介入调查处理，更小菜一碟。

监管“假宽带”不能陷入“技术依赖”，监管部门不能等到相关技术和管理规则建立健全之后，才去有效行使监管权，更应思考的是，现有的法律和行政手段，还有多少在“闲置”，只有主动积极的监管姿态，才能使无奈运营商有所畏惧。

我们甚至可以说，治理“假宽带”，技术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监管部门积极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破除垄断，严打潜规则，拆除信息不对称，那么即便难以从技术上判断宽带的真假，用户也可根据自己的使用体验，用脚投票，从而倒逼运营商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结果。方国